

战火中的浙东抗币

方平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其间还开展了大规模的货币战。他们操纵傀儡银行，发行日伪中储蓄券（储备票）、制造假法币，极力打压当时流通的法币，扰乱金融市场，造成物价飞涨，从中攫取侵吞大量物资，企图摧垮我国的经济战斗力。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各抗日根据地，为了抵制日寇的金融侵略、应对伪储备票冲击市场，先后发行了苏中抗币、皖中抗币、晋冀冀边区、冀钞、鄂豫皖边区“建设币”、晋绥边区西北农民银行“西农币”、山东根据地“北海币”……

在这场经济斗争中，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发行的“抗币”，不仅在控制根据地的金融市场、稳定物价、发展生产、保障部队供给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成立浙东银行，发行抗币

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之初，金融仍为伪币所控制。随着伪币价值猛跌，根据地军民生活及一切经济活动，受到了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发行使用自己的货币已是迫在眉睫。正如当年浙东行政公署主任连柏生所说：“在对敌经济斗争中，首先必须有效地抵制伪币的流通，使敌不能利用伪票来搜刮我物资，使人民不吃伪票跌价的亏。同时，我们解放区应当有健全的金融制度，平稳物价，才能进一步发展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为此，就必须学习华北、华中各先进解放区胜利经验，筹设一个银行，同时发行抗币。”（据1945年4月6日《新浙东报》）。

1945年1月下旬，浙东各界临时代表大会在余姚梁弄正蒙小学召开，根据四明地区代表的提案，大会作出了建立自己的金融机构、发行抗币的决议。

4月1日，浙东行政公署报请中共中央华中局同意后，召开社会各界人士和党政军机关代表参加的盛大群众大会，公布了《浙东行政公署抗币条例》与《浙东银行条例》，任命吴山民为浙东银行董事长，郭静唐、陆慕云为常务董事，负责日常事务，并推选谭启龙、杨思一、楼适夷任监察人；总经理由浙东行政公署副主任吴山民兼任，陆慕云任副总经理，王海峰任襄理兼金库主任。浙东银行下设四明分行、三北分行、余姚支行，后又设鄞县、南山、上虞等支行，业务遍及浙东行署所辖14县14区。当时浙东银行资本额为200万元，价值相当于食米200万市斤。

华中局在批复中对发行浙东抗币作出了六条具体指示，强调抗币发行后，应确定其是抗日政府的本位货币，在同法币联合或同伪币斗争的过程中要力争主动，应联合法币在基本区坚决打击伪币；抗币发行时应按自己的客观条件，确定抗币与法币的比价，比价不宜太低（当时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比价情况为：“苏中”发行时，抗币与法币的比价为1元比5元，这个比价太低；“皖中”抗币是1元比30元。新四军一、二、三、四师地区比价一律为1元比50元）。比价的提高，原则上应以根据地几种主要农副产品物价的指数平均数为标准，保持相对稳定。

从石印开始印制抗币

印刷抗币的任务，早在1945年初就交给了浙东韬奋书店。由于当时印刷抗币的设备和技术力量都不足，就通过上海地下党与文化单位联系制造抗币的全套铜版，运到四明山后，却因技术原因不能使用。印刷工人发挥集体智慧的力量，研制了石版，采用石印办法，终于在4月1日前印制出了第一批合格的抗币。为了保密，最初印币厂设在杜徐岙山腰里，搭建了三间茅草房作印刷车间，上去要爬较陡的山坡，竹林茂密，十分隐蔽。

6月，为了适应大量印制抗币的需要，组织上派吴建平同志带了10两黄金和两袋抗币，先到海边兑换伪币，再去上海采购印刷器材。然后由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印刷厂在上虞小陈蚕乡王家坪村套印号码，加盖四明集团章，清点数量，打包入库，再由浙东银行发行。抗币有四种面值：壹元券、伍元券、拾元券、伍拾元券（实际上只发行了前三种），是用上海道林

纸印的。至于抗币的辅币，除浙东银行分行、支行印刷发行外，各地及县以下区乡也有发行。有壹角、贰角、伍角、壹元等。商会也印辅币，分币就是由商会印发的。

抗币的后盾以稻谷为主，还有金银、固定资产。后来实际上只发行了100万元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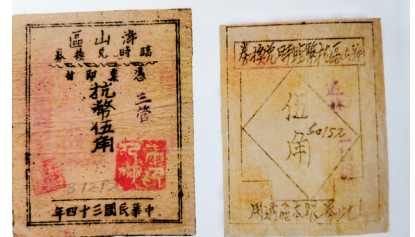
浙东抗币与法币、中储蓄券的兑换，是参照华中地区和其他根据地的比率、结合本地实际来确定的，随时会有变化。如：1945年4月10日，1元抗币兑换50元法币，兑换300元伪中储蓄券；5月16日，1元抗币兑换伪中储蓄券500元；7月9日，1元抗币兑换伪中储蓄券1200元，8月初兑换1600元，及至日本投降，陆续停止兑换。



浙东银行地方本位币拾圆



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金库兑换券拾圆



左：浙山区抗币临时兑换券伍角(三管) 右：浙山区抗币临时兑换券伍角(造林)



观城区署临时兑换券伍角(方平供图)

在法币、伪币急剧贬值时，抗币也曾经历两次波动，但是抗币币值基本上是稳定的，在根据地及部分游击区占领了金融市场，对稳定物价、保障人民生活、发展生产、支持抗战作出了贡献。

抗币受到各界群众欢迎

抗币发行后，成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基本的流通货币，币值保持稳定，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

据《新浙东报》1945年5月30日报道：慈北“龙山教育会学习小组日前召开抗币问题座谈会，尚有地方士绅及青年到会，某士绅说：‘抗币是我们的救星，它今后将像米票那样受人欢迎并信任，而且其作用远在米票之上，人人当然乐于接受。’”又一士绅说：‘我们要保证抗币通行无阻，除告诉老百姓什么是抗币外，并须动员大商店大量兑换应用。’

同日报道：庄市镇商民看到抗币后，要求发角币及设立兑换处。一个修钟表的人拿到一张五元抗币后讲：“我真欢喜，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了，有了这钞票，物价可以平稳了。”

鄞江士绅陈××说：“抗币发行后，市价可以稳定了。有钱的也没占便宜，没钱的也不会吃亏，我们根据地更加安定了。还希望能发五角、一元的抗币，则更能流通市面。”

5月23日的《新浙东报》报道，“宁波、余姚城中的商人，近来也纷纷使用与收藏我浙东银行发行的抗币。一个宁波单帮对我解放区商人说：‘城里商人也要抗币。现在储备币，比草纸还要多，带在身边很不便，顶好付抗币给我。’”“余姚城中××百货商店老板把四万元伪币托单帮拿来我区调换抗币，并对配货的单帮说：‘下次你们拿抗币来好了，我们很欢迎。’”

金库兑换券——抗币前身

其实，在抗币正式发行之前，浙东抗日根据地已经摸索着发行了金库兑换券。金库兑换券以金库名义发行，具有规定的兑换值。开始时，它在民主政府各部门内发行使用，是一种代用性质的货币。随着根据地不断扩大，群众对抗币的需求量急骤增加，金库兑换券就成为了一种补充性质的货币了。

这些兑换券常冠有地名和“临时”“抗币”等字样，表示使用区域、代用性质以及对抗币的依附性。由于各地发行力量薄弱，印刷条件简陋，金库兑换券制作粗糙，多为蜡刻或木刻，容易被伪造，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但它在排挤、打击伪币，占领金融阵地、发展城乡经济建设和促进根据地建设等方面，还是起了很大作用。在全国各抗日根据地中，发行金库兑换券，为浙东抗日根据地所独创。

不管金库兑换券、商会币还是抗币，根据地军民统称为“三五支队币”。

及时收回抗币，不让群众利益受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胜利。

9月20日，华中局转发中共中央电报，命令新四军浙东纵队及地方党政干部，除留下秘密工作者和少数武装人员外，必须在7天之内全部撤离浙东，开赴苏北。

据陆慕云同志回忆，由于北撤日期紧，行政公署财经处和银行的同志，都分散随部队行军。他们随带金银基金，解决部队行军中的需要，并销毁抗币。

对于流通在社会上的抗币，为了保护群众利益，在区委和行政公署的统一部署下，由各县政府所在地负责兑换，并委派海防大队政委吕炳奎负责办理。在庵东、道路头、龙山、陆家埠等地设立了兑换处，均按照浙东行政公署公布的抗币条例规定，1元抗币兑换粮食半公斤。兑换是比较彻底的，即使有来不及兑换的，之后在浙东敌后并入华中银行后仍可兑换，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开始，又分几次按当时大米牌价，由人民银行收兑，直到1959年全部兑换完毕，保障群众不受一点损失。

时任四明山大岚区财经指导员的王授军同志，曾撰文回忆接到北撤命令后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抗币兑换情况：

“抗币在大岚区流散数目极大。为避免人民的损失，上级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全部抗币收回。我们做了深入的动员工作，要群众于规定的时间内持抗币购买稻谷。为了迅速收回抗币，粮站同志分头负责包干。

“开始有人不肯来换，宁愿将抗币藏在家里，因为那时尚有少数游匪流窜，带了抗币走比较方便，并且随时可以买到必要的物品。经我们深入访问，再三动员说服，群众才以抗币购买稻谷。但还有少数持币者，直至北撤时，还未来挑谷，我们就委托留下来的同志把稻谷保管起来，以便这些持币者来换稻谷，真正使人民不受损失。

“我们把换来的抗币如数上交至四明特办。当夜下着大雨，我们经梁弄到上虞县城集中，做好北撤准备。于规定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上船至杭州湾澈浦登陆，遇上国民党部队的阻挠，我五支队当即抢占山头，投入战斗，上级下令把集中的抗币烧了以便轻装突围。我们浙东纵队指战员身上带着的抗币，到山东解放区后调换成北海币，从此完成了浙东抗币的历史使命。”

（作者系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顾问）



1964年，靳铮（后排左五）与幼儿园小朋友合影。（瑜语供图）

走人生路，离不开引路人。他们就象黑夜的火炬，天空的北斗，引领你不断前行。靳铮老师就是我少时引路人。

对靳老师的最初印象，是在医院。我幼时一次发烧住院，靳老师特地来看我。其实从我父母结婚，两家就是邻居，最初几年还共用一个阳台，朝夕相处二十多年。靳老师有五个孩子，当时除一个还在山东读书，其他几个都去当了兵。

从大人们口中得知，靳老师是山东沂水人，她的父亲靳星五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1940年靳老师刚满15岁，父亲带她去中共沂水县委担任文书工作，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49年5月，她随第三野战军南下杭州，后到宁波。

从小时候上的一所部队幼儿园，靳老师是幼儿园主任。刚上幼儿园时，我总是吵着要回外婆家。幼儿园在江东南门巷，和外婆家隔一条新河，步行也就几分钟。有一次，幼儿园老师带着我们外出，走着走着，一个提着竹菜篮的熟悉身影迎面走来。“外婆！”我突然喊起来，跑出队伍扑到外婆怀里，一时泪眼婆娑，仿佛受了莫大的委屈，执意要跟外婆走。第二天，我被爸爸拽回到幼儿园。长大后，这个小插曲经常被靳老师调侃：“你小时候在幼儿园调皮自由，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呵呵！”

1969年，部队幼儿园撤销，我也快到上小学年龄，在家里待着。正好靳老师在退休了，也在家里。我俩几乎天天见面，关系更亲近了。如果不去外婆家，我就会在阳台上一边帮靳老师择菜、剥毛豆，一边听她讲亲身经历的战斗故事。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我至今记忆犹新。1940年至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残酷、最艰苦、最悲壮的历史时期。侵华日军集结数十万精锐部队，对全国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扫荡，妄想消灭我主力部队。山东沂蒙革命根据地也遭遇日寇大扫荡。1942年，靳老师在沂蒙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任会计，还兼顾北海银行根据地的印刷、登记、发行等工作，随地方部队一起行动。

靳老师说：“那时候条件简陋，我们用油墨印刷纸币，纸张粗糙，但一点也不能浪费。有一次，我和另外两位女同志正在印钞票，突然鬼子和伪军300余人前来扫荡。接到撤离的命令时，鬼子已经进入村，如果从村口突围，就有可能与鬼子正面遭遇。我们3人只有一颗手榴弹，危急时刻，我果断地对同伴说，俺们去后院内钻高粱地！于是，一路快跑到高粱地隐蔽起来。3个人紧紧地拥抱着，一个说万一被发现怎么办？另一个说我不想死。我说，俺也不想死，但俺们不能落到鬼子手里。如果被鬼子发现，俺们就拉响手榴弹，与鬼子同归于尽！后来幸亏天黑，鬼子和伪军在村里胡乱开枪一通，烧了房子，抢了物资，折腾够了，又害怕八路军打他们伏击，就撤回城里……”

我问她：“当时您害怕吗？”“刚开始当然害怕，有了战斗经验胆子就大了，渐渐地更勇敢了。那时候内心一直有信念和憧憬，等赶走了日本鬼子，消灭了反动派，更多的人就能过好日子了。”靳老师深情地说。

除了讲故事，靳老师还教我唱很多歌曲，背诵诗歌。我清晰地记得靳老师教的两首歌，一首是她最喜欢哼唱的《沂蒙山小调》：“人人那个都说沂蒙山好……”多少年过去了，我还是忘不了那悠扬的旋律。另一首是《在太行山上》。记得有次全校举行合唱比赛，我们年级组就唱《在太行山上》，我自信满满协助老师教同学。一唱起“红日照遍了东方……”仿佛看到巍峨雄壮的太行山上，中华儿女奋起抗战的战斗场面，顿时心潮澎湃，激情四射。

老战士靳铮：我的少时引路人

瑜语

当年老房子，我家居北，靳老师家居南，朝东墙上各有一扇大大的木制花格玻璃窗，中间有一个连接两家的阳台，白天各家的门都是敞开的，四面通风，非常凉快，夏天就在地板上铺草席睡觉。午睡时，爸爸也经常教我唱儿歌，还让我跟他一起背“老三篇”。有次午睡时，爸爸正领着我背诵“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突然听到站在阳台南面的靳老师提高嗓门喊：“哎呀，我的同志哥，你的普通话不行，被你教走样了……”那年我才六岁。从那时起，靳老师就隔三差五地把我叫到阳台上，面对面坐着，用略带山东口音的普通话教我背诵《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讲述张思德、白求恩的故事。我虽然似懂非懂，却难以忘怀。

我上小学后，开始帮父母做家务。有一次，靳老师看到我在生炉子，热心地指点让炉子烧旺的诀窍。她还经常在我父母面前，夸我能干勤快，是个好孩子。那个年代，班主任都会来家访，有好几回，我或妹妹的班主任来家里，爸妈还没下班，靳老师就当仁不让成了我和妹妹的家长，热情地和老师交流，介绍姐妹俩在家的情况，就像在说自己的样子，还感谢老师的辛勤付出。后来小学班主任老师问我：“这个靳老师是你家亲戚吗？怎么对你那么了解、那么亲？”我说：“是的，确实很亲！”

我和靳老师年纪相仿，一个是从四明山区嫁到城里的家庭主妇，一个是南征北战的革命老前辈，因为我这个“纽带”，两位长辈经常见面。外婆很会干家务，总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经常带来我和妹妹爱吃的酒酿圆子。靳老师很佩服外婆做家务的能力，总夸外婆烧得好，还向外婆讨教宁波菜的烧法，像四鲜烤麸、醋熘带鱼等等。外婆也向靳老师请教面食的做法。我外婆没读过书，很羡慕靳老师有文化。靳老师爷爷是晚清秀才，曾创办私塾普及同村孩子教育。靳老师6岁时就在爷爷的私塾里读书识字，12岁进沂水县初级小学女子速成班读书。外婆见靳老师看报纸，就说：“如果我识字就好了。”两人的对话非常有意思，一个南腔，一个北调。外婆问：“靳主任，你做淡包（馒头）生活（手艺）好伐？”靳老师纳闷：“馒头做得好不好，与生活好坏没关系呀……”大家不约而同大笑。她们交流的时候，我常常成了翻译。有一点外婆很得意：小时候没被缠过脚，走路来，腰板笔挺。而靳老师小时候却受过裹脚的痛苦，亏得其父亲干预，早早解除了束缚，但年幼时的强行扭曲，造成她的脚畸形，特别是小脚趾头整个贴着脚底扭曲着，让人看了唏嘘不已。

别看靳老师乐观豁达，也有遗憾和心结。1952年12月，全军10万女军人集体转业，靳老师含泪脱下心爱的军装。1969年，当组织上安排靳老师去新华书店担任党组织负责人时，又因为家庭原因提前退休。1982年改为离休。靳老师大儿子出生于1947年，当时靳老师随部队正进军至江苏新沂的途中，大儿子只好寄养在当地老乡家里，一年后由孩子的大伯接回山东老家。因大伯没有孩子，靳老师的大儿子和小女儿就留在了山东亲人身边。5个孩子南北分离，作为母亲，思念的心情可想而知。靳老师有时也会调侃：“如果我1955年授衔，应该是上尉正连，进步就快了。”

靳老师曾对我说：“有时候我内心不甘，不到50岁就休息在家，但想想我那些牺牲的战友，想想有的退伍后还在山东老家务农，我就一点也不委屈了。我现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老党员、老革命的样子要保持好。你长大后要争取早日入党，多做有益的事。”现在想来，这也许就是我早期受到的信仰启蒙吧。

1985年，靳老师和同是老革命的老伴搬入部队干休所，我家也搬到了新住处，两家就分开了，但我和靳老师一家仍保持着联系。记得1987年3月我入党后，靳老师从自己小儿子处得知消息，专门捎信表示祝贺，鼓励我继续努力进步。

2007年5月1日，靳铮老师因病离世，享年82岁。转眼间，我也快到耳顺之年，时不时记起那些和靳老师在一起的时光。八一年前，我和靳老师的小儿子一起，来到樟村四明山烈士陵园，把一束鲜花，献给敬爱的老师！